

论资本影响与媒体舆论的博弈

黄楚新 郭海威

摘要

本文在对资本和舆论相关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资本和舆论领域的关联性,对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传播的新特征和舆论斗争的新特点做了详细梳理和分析。文章具体剖析了资本介入对舆论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新挑战,并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主流话语建设三个方面探究了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文化、政策和产业三个方面提出防范资本影响和操控舆论的具体实现路径。

关键词

资本、舆论、舆论安全、舆论操控、舆论引导

作者简介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电邮:huangchuxin@163.com。

郭海威,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the Impacting of Capital and Media

HUANG Chuxin, GUO Haiw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cepts related to capital and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capital and public opinion,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abou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d and controlled by capital and the new features of public opinion struggle. It analyz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apital intervention on public opinion work and the new challenges brought to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detail, and explores the risks of public opinion safety under the capital influence and control from external factors, internal factors and mainstream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ncrete ways of preventing capital influencing and controlling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e, policy and industry.

Keywords

Capit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security, Public opinion control,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uthors

Huang Chuxin is professor & Ph.D, the vice director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New Media Study Center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rector of the Journalism Studies Department at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huangchuxin@163.com.

GUO Haiwei is a Ph.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曾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它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个体感知当前社会意见气候,进而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周围环境的“皮肤”;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效保持和促进社会整合,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的社会解体(Noelle-Neumann, 1980/1993: 61-62)。由此可见,舆论对于社会整体和个体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近年来多起社会热点事件引发激烈的舆论纷争,人们开始发现这些舆论纷争背后都有着资本的影子,资本试图影响和操控舆论的话题开始引起社会关注。正确认知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操控,对于党和政府在舆论领域占据主导权和控制权、引导舆论健康发展、保障舆论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等工作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和舆论的相关概念辨析

(一) 对资本的认识与发展

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生成的产物,且其自身形态与功能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导致人们难以认识其本质。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优化和消亡的过程中。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详细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资本与生产工具或者劳动成果等而视之的行为,他提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再次做了解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马克思, 1867/2004: 922)与此同时,他还从资本不断变化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马克思,

1894/1979: 226)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马克思, 1848/1995: 277)

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列宁提出应该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实践中正确认识资本的地位和意义, 尤其是针对资本的使用和控制方面。列宁提出要对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加以吸收和借鉴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所运用, 并科学的论证了资本的矛盾性以及资本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的必要性, 他认为政治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因此可以对资本的运用限定范围, 对资本进行有效的利用, 而又不让其超出控制范围, 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来怎样, 这要由我们来决定”(列宁, 1922/1987: 84)。“给予资本主义的范围, 是十分狭小, 十分‘适度’的。”(列宁, 1921/1995: 527)

现代资本则可以以二战为分界线, 划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后一阶段中, 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生产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资本也开始从国家垄断朝向国际垄断演化(张婷, 2015)。整体来看, 现代资本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得到新发展, 三次科技革命中各种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生产力水平提升有巨大推动作用; 二是资本形态发生了新变化, 包括新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现代资本分配方式上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新发展。

(二) 舆论和舆论安全

若是将多个个体组成了群体就社会事件或现象进行的讨论看作是舆论, 可以说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舆论, 这种表面的讨论现象对于社会成员和社会整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Krippendorff, 2005)。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阶段都有众多学者和思想家对舆论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美国学者哈伍德(Harwood L. Childs)的研究显示, 针对舆论的具体定义就有50多个(Harwood, 1965)。但是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 这些定义在侧重上也有所不同。整体来看, 以下三种定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是认为舆论表达了社会的整体感知和集合意识, 是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刘建明, 1988: 11); 二是认为舆论是社会成员对新近出现的、普遍关心的、具有争议性话题的共同意见(喻国明, 1993: 227); 三是认为舆论是社会公众对于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现象的观点、态度和意见的综合, 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持续性和强烈程度, 且对事物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孟小平, 1988: 36)。虽然论述角度各有不同和侧重, 但都认为舆论是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对已

有研究的综合考察基础上,可以对舆论这样下定义:舆论是社会成员或组织对于具体的社会现象或事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公开表达和讨论,对于事件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表现出统一性、持续性的观点、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随着舆论影响的广泛性以及传媒的快速发展,舆论安全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李忠伟,2014)。舆论安全关注的焦点是舆论能否对社会利益进行正常的维护和保障,这种功能的具体表现往往又受到舆论信息的传达、引导以及舆论的自我发展和更正能力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舆论安全做如下定义:在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复杂社会环境下,舆论的信息传达、舆论引导及舆论的自我更正能力等不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或阻碍,舆论可以有效实现其保障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健康发展不受侵害的能力。

二、资本和舆论领域的关联性分析

(一) 资本与传媒

从全球各传媒集团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在传媒发展过程中,资本始终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资本介入传媒的过程一直充满挫折与阻碍,从开始的直接拒绝到后来尝试性的介入再到后期的全面对接,资本一直在摸索着介入传媒业后的行动界限,也就产生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下资本和传媒的微妙联系,1999年电广传媒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开启了资本进入传媒的发展之路(赵曙光,2002)。从资本开始介入传媒至今的近二十年中,由于受到宣传职能和经营任务双重属性的约束,我国传媒业一直在受到来自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两面影响(谢耘耕,2006)。首先,资本与国资传媒企业合作的过程,也是资本一直尝试触碰和渗透政策底线的过程,通过对传媒领域逐步介入并试图进行控制,同时也不断尝试逾越政策限制。其次,不同于在国资传媒领域的谨慎和拘束,资本在互联网领域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同互联网领域相互促进、共享共荣。另外,资本在介入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主要传媒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深入到传媒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且日益转化成上下游产业链的中坚力量。

然而,随着资本与传媒领域的融合愈发深入,对于传媒的控制权之争也愈发激烈,其中涉及投资者、实际管理者以及国家作为最高控制者之间的多方较量,控制权的归属对传媒的发展导向以及舆论导向有着决定性作用,需要引起重视。

(二) 资本与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源于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口号,之后美国在其《独立宣言》中

首次使用了“新闻自由”的概念（郝月峰，2017）。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提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出版的自由（李道揆，1999：788）。此后，伴随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演进，新闻自由理念得到拓展和深化，“第四权力”“看门狗”“社会瞭望者”等概念也不断产生，逐步发展为自由主义新闻学的核心理念。

在传媒领域，资本一直在鼓吹传媒资本化和产业化，试图将传媒以纯公司化的手段加以控制和运营。然而，在资本集团大肆宣扬观点的自由市场的同时，受其控制的传媒领域却常常唯利是图，以自身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为标准，对新闻信息加以分类和标签化。其所推崇的新闻自由的本质是保障其所掌控的传媒的自由，而非给普通民众表达观点和意见的自由，新闻内容被选择性报道甚至被扭曲的现象大量存在，导致社会中话语权的严重失衡。自由媒体的概念此时显然已不成立，不是因为受到政治干涉和控制，而是受到来自资本的“绝妙的审查”，这种“审查”更为隐蔽和危险（胡翼青，2015：275）。

（三）资本与舆论

当资本集团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李希光，毛伟，2015）。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世界，通常都是“精英设置议题，普通网民参与讨论”，最终构筑了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讨论的“民主”环境。偶尔会出现少数民众突破精英所设置的议题范围，试图设置和主导舆论议题，争夺话语权，但却与资本集团的利益相冲突而受到相关规制。

由于现代发达的“舆论技术”具有引导性，大众传媒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胡翼青，2015：197）。随着资本对传媒市场的介入程度逐步加深，资本开始利用所控制的媒体来表达自身价值观，维护自身利益。此时的资本对社会舆论也就有了较大的控制权，通过其所控制媒体实现了对舆论某种程度上的引导和控制，新闻专业主义和公众话语权也就难以获得保证（李希光，2014）。如当下我国的传媒领域中，会经常见到个别媒体对社会问题大肆报道，渲染和加剧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进而误导社会舆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与阶层对立，深入研究会发现，这些传媒公司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民间资本或是境外资本的介入，其中必然裹挟着巨大的商业利益诉求，甚至其目的就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攻击与消解，通过不断刺激民众的敏感神经，将社会舆论引入错误和失控的一面。

三、资本影响和操控下的舆论发展现状

（一）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传播的新特征

意义与噪音共生。随着资本与传媒合作与融合的深入,传媒业得以迅速发展,传播样态也发生了显著改变,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多元化趋势明显。其中,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认可与期待等都在媒体网络中得到显著表述和传播,正面意义得以彰显。但与此同时,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部分媒体受到资本操控,使得当前信息传播空间中夹杂着多种噪音,对社会舆论造成严重误导(黄楚新,彭韵佳,2017)。尤其目前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为追求商业利益,大量非主流甚至极端性的噪音泛起,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主流声音,对主流舆论产生巨大冲击和消解作用。

虚拟与现实交织。当前传媒发展已远远超出传统传媒时代的界限,成为一个超时空的虚拟领域,然而虚拟始终是现实的映射,与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国内舆论领域中,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和上升期,国家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体制机制变革,阶层矛盾有所凸显,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越发多元。在此情境下,部分利益团体借助传媒平台大肆炒作和挑起社会敏感情绪,将个别社会问题在网络空间进行夸大传播,渲染和煽动不良情绪,引发舆论纷争,继而从中牟利,影响恶劣。在国际舆论领域中,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迅速崛起,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和阻击,这种抵制和阻击目前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冯宏良,2014)。借助资本介入传媒领域继而影响和操控舆论就是最典型手段,一些受境外资本影响的媒体有意识地对我国社会问题进行偏向性报道和解读,试图影响甚至引导国内和国际舆论走势。

利益与责任错位。资本介入和影响下的传媒领域始终存在着追求商业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悖论(杭敏, Picard, 2011)。一方面,在舆论领域中具有指导和示范意义的传媒机构,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公共职能,同时也为公众提供发声的机会;另一方面,受资本介入和影响,传媒机构开始将追逐商业利益和为资本集团服务作为首要目标,从而逐渐将其所担负的社会职能搁置一旁。这也就导致了当前舆论传播领域中利益与责任的错位,使得在某些热点议题上舆论向极端化发展,舆论安全面临重大威胁与挑战。与此同时,舆论传播领域中利益与责任的错位对重点人群如青年群体的影响最为强烈,尤其是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复杂的舆论形势往往让他们难以辨识,从而导致社会信仰的缺失。

单向与互动并存。在现代舆论传播领域中,随着技术赋权逐渐实现,公众开始拥有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同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互动。这表面看来是实现了传播中各主体的平等,然而占据信息发布主导性地位的大型传媒机构

在向公众发布和传达信息的时候,仍存在着显著的单向传播趋势,这是因为在资本的支持下,一些传媒公司控制着信息传播平台和传播规则的制定,始终掌握着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与主导权,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交流并不存在。这种传播霸权被资本牢牢掌控在手中,使得舆论安全面临潜在的巨大威胁。

(二) 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斗争的新特点

舆论斗争影响深刻化。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普及之前,受限于当时的传播技术与社会环境,舆论斗争领域相对狭窄。国内方面,由于社会民众发声渠道相对较少,主要接受国有传媒的宣传,国内思想意识较为统一,很少有不同观点出现或扩散,因此也就很少有激烈的舆论斗争;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其方式主要是拉拢和培养国内的异见分子、反动分子等人员,对其进行西方价值观、世界观等的驯化,从而让这些人在国内搅乱舆论,妄图通过散布反动和分裂性言论,对我国进行颠覆性活动,但是其所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当前时期,随着新媒体等技术手段的发展与普及,加之资本对传媒领域的渗透逐步深入,信息传播格局面临重构。在此基础上,境外资本往往同时兼顾自身商业利益及所属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扩散任务,通过介入传媒领域,积极施加影响力,加大对我国舆论领域的侵蚀力度,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和所谓民主观,不断对我国主流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和挑战。通过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在各个领域和各阶层人群中进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宣传,舆论斗争的影响更加深刻。同样,国内民间资本受利益驱动所进行的控制和影响传媒的活动也造成了舆论斗争影响的深刻性,舆论斗争主题更多地偏向社会矛盾等议题,但也存在试图控制舆论发展态势的行为和尝试,需要引起警惕(高山,国园,赵栋,2017)。

舆论斗争范围扩大化。由于社会中不同价值取向或者意识形态的存在,舆论领域中的斗争从未间断。早期我国的舆论斗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其主题都相对较为单一,且舆论斗争的手段、领域、参与对象等都相对有限,因此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有所局限。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一些传媒受制于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舆论斗争的范围明显扩大。在舆论斗争的主题上,从过去的阶级矛盾、制度之争扩大到了目前的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对立、生态环境、人权、宗教、民生等众多领域;舆论纷争的导火索从意外的政治事件扩大到了当前社会中的群体事件、公共安全、国际社会重大事件等;参与舆论斗争的行为主体从以往的青年学生主群体发展成目前的社会各个阶层;在舆论斗争采用的手段上,从以往的利用传统

媒体或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到使用互联网等多种新媒体手段对舆论领域采取全方位立体式的渗透和攻击；而舆论斗争的方式也扩大到学术辩论、思想侵蚀等多种形式。总之，随着资本介入的深化，舆论领域的斗争范围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舆论斗争形势越发复杂和严峻，舆论安全面临被全面攻击和消解的风险。

舆论斗争方式隐蔽化。早期的舆论斗争方式表现为舆论的相互对抗，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舆论压制表现得更加直接，通过各大资本财团所控制的媒体对我国进行赤裸裸地丑化和遏制，试图以强大的资本和传媒优势摧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随着当前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西方财团资本开始进入到中国投资，同时国内民间资本也加入到投资者的行列之中，舆论领域中的斗争方式趋于隐蔽化。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目前不断调整策略，试图通过文化输出或倡导网络自由等方式向我国传达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这种方式更加隐蔽，难以被察觉，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我国舆论领域的渗透和同化。尤其是近年来，境外资本通过其投资和控制的境内外传媒机构向我国大量传播其带有明显反动和消极色彩的文化产品，对我国舆论领域的攻击和消解更具迷惑性，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现对舆论领域的逐步渗透。另外，国内民间资本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设置热点议题来吸引人们关注，达到制造和引导舆论的目的，究其本质来说还是在为商业利益服务。但是，这些行为都直接加剧了当前舆论斗争的激烈程度，扩大了斗争范围，给舆论管控和引导带来巨大威胁和挑战。

四、资本介入对我国舆论领域的影响

（一）资本介入对舆论工作的积极影响

资本介入变革了舆论传播格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1867/1975：410）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技术虽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它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演化却能产生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社会中，资本所催生的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加速了全球性信息传播系统的建立，新型传播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民众没有话语权、传媒机构依照特定价值观念进行单向信息传播、舆论始终处于国家和政府的掌控之下的固定模式，舆论传播开始进入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在促进信息实时性、全方位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增强着社会联系与互动，新型舆论传播格局由此形成。

资本介入丰富了舆论信息资源。在资本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受资本意志所控

制的各种社会信息、思想文化信息、价值观念信息等以全媒体的形式实现了即时传达和扩散,丰富了公众的社会认知和观念体系,为公众带来极为广泛的各类议题,提升了社会舆论话题的丰富度。资本意志催生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然而实现其商业利益的关键性抓手就是为社会舆论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各种传播平台向社会公众传输特定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信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另外,资本的介入在提供多元社会思想的同时,也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和聚合能力,弥合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民众之间的认知罅隙,提升社会民众对主流话语和舆论的理解和认同,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认知能力和文化认同感。

资本介入拓展了舆论工作手段。资本集团借助各种传播渠道传播其特定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以求实现在舆论领域占据主导权和控制权,这一方面丰富了舆论话题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给舆论工作提供了更多渠道和手段的借鉴。新型传播技术借助自身技术优势对舆论领域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改造力,而政府在舆论工作中亦可借鉴和运用这种影响力,通过新型传播技术发布和传播信息,一方面能够同民众打成一片,增强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进而在舆论传播领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舆论工作手段的拓展也能有效提升和增强政府对舆论的操控能力,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又保证了舆论的健康稳定发展。

资本介入倒逼社会主体创新舆论工作方法。伴随资本对传媒的介入程度逐步加深,资本开始通过制造热点话题试图引导舆论走向,这也使得各社会主体不得不积极创新和改进舆论工作方法,学习利用新型传播技术、创新传播方式,以及时回应社会舆论,有效抵制负面或谣言信息扩散。这种倒逼之下的自我创新与自我提升对于应对突发舆情、保障社会稳定和舆论安全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资本介入给舆论领域带来新挑战

资本介入加大了舆论的引导难度。资本开始介入传媒业,加之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公众通过新媒体等手段获得了话语权,信息互动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在资本的影响和控制下,媒体组织的信息传播开始出现偏向性,多元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在传媒领域泛滥并呈爆发式增长和迅速进化,这些非主流文化的盛行一方面扰乱了民众的传统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也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冲击,给舆论安全带来威胁。而由于信息的巨大体量、互联网等新媒体空间的复杂性以及资本集团的极力抵制,政府对舆论的引导难度明显加大,难以像传统媒体时代一样通过完全掌控传媒来实现舆论安全的保障。

资本介入弱化了舆论的控制力度。在现代传媒环境中,社会公众通过使用新媒体手段,获取信息方式更加多样,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相伴而生的则是各种负面性、非主流的话语侵入主流舆论,对社会舆论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甚至会主导舆论走势。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认为“现代新兴媒体其实已变成了政党的最大竞争者,这些新兴媒体开始和政党抢夺受众,抢占对于社会主流舆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些原来为政党所有的舆论宣传、教育等功能,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已逐渐退化和瓦解。”(Meyer, 2000)在资本介入的现代传媒领域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各种负面和有害言论夹杂其中,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力度明显被弱化,难以实现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控制效果。

资本介入增加了舆论的安全维度。传统媒体环境下,政府所要管控的舆论安全通常只有传媒这一个维度,只要做好传媒机构的审核与把关,就能有效确保舆论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尤其有资本介入传媒的情况下,舆论的安全维度就不只有国资传媒这一个维度,还有各种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控制的传媒公司,尤其是互联网这个大的虚拟空间,因此舆论安全的维度显著增加,导致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难度加大。要做好舆论安全工作,不但需要对虚假、负面信息加以阻击和防控,也要积极通过互联网新型传播手段向公众传达准确信息,保证公众对社会现状的知情权与话语权,化解舆论安全风险。

资本介入加剧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便捷性和丰富性吸引了大量民众使用,面对如此巨大的受众市场,各类资本纷纷投资入股新媒体领域,在潜移默化中对新媒体领域实施严格控制和操纵。虽然我国对互联网内容生产传播等环节有所规制,但是受资本逐利性驱使,一些新媒体平台经常在内容生产、传播的把关方面处于越轨或缺位状态,导致各种刻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追求刺激、抨击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等内容成为新媒体领域中吸引关注、聚集人气的有效手段。各种消极性、负面性甚至反动性和颠覆性的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念大肆进入我国网络空间传播扩散,为渗透、攻击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供了话语基础(匡长福, 2012)。对舆论领域的渗透和瓦解力度越发增大,导致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发生混乱,主流价值体系也存在被消解和摧毁的风险。

(三) 资本影响和操控下舆论安全风险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对舆论安全的威胁。近年来国际形势愈发复杂,西方国家开始借助其强大的资本优势,通过各种隐蔽手段试图渗透至我国舆论领域中并施加影响。目前

来看,西方等国家借助资本优势对我国进行的舆论渗透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通过所控制的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宣传,以所谓的人权、民主等为幌子,大肆宣扬其虚假的普世价值,试图引发国际和国内舆论纷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其所控制的文化传媒企业,凭借自身的资本和传播优势地位,向我国输出其意识形态,试图渗透和消解我国主流话语;三是通过资本投资国内文化传媒企业,无形中向所投资传媒企业施加影响和控制,曲解或误导社会舆论,引发舆论领域争论;四是借助自身互联网资源优势,持续实施网络舆论渗透,通过网络向国内民众散布刺激性、煽动性的言论和观点,伺机对舆论领域发动全面攻击。

内部因素对舆论安全的挑战。目前看来,国内民间资本介入对舆论安全带来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资本进入舆论领域所裹挟的多元思想与一元指导思想所发生的冲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地位,一直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底线和原则。然而在资本介入社会各领域的过程中,多元社会思潮出现并日趋活跃,其本质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与我国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冲突。二是资本所带来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同国内主流理想信念相冲突。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种价值取向同主流社会信念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形成鲜明对立,也是社会成员的思想信念发生动摇和混乱的最终根源,造成社会中价值观的混乱和思想意识的模糊。三是在资本所控制的传媒领域,往往出于吸引关注取得商业利益的目的,无视、允许甚至引导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国内一些反动势力借此在这些媒体平台大肆发表反动性言论,攻击主流意识形态,试图超越甚至消解主流话语体系,从而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讨论,对舆论安全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主流话语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在资本对社会建设各领域尤其是传媒领域介入愈发深入的过程中,我国主流话语建设在理论与宣传上都存在着各种短板和不足,成为舆论领域问题频发、屡遭攻击的重要原因,需要尽快补充完善。首先,在主流话语体系的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仍需继续完善和优化,需加快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进程,结合我国具体社会发展现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学习,使之能够符合我国的社会现实,提升主流话语在舆论斗争中的说服力(傅其林,冯春天,2014)。其次,在宣传力度上,主流话语体系的宣传不够使得其对舆论的引导力也不断减弱。针对频现的社会敏感话题或事件的解释中,主流话语的缺失、生硬的回应与解读以及脱离现实空喊口号都造成了主流话语信服力的减弱(李春雨,2015)。

五、防范资本影响和操控舆论的实现路径

（一）加强文化领域管控意识，防控舆论风险

深化资本渗透意识，提升错误思潮抵制力。一是针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文化传媒领域从业者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升其对资本所裹挟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力（邹庆华，2015）。二是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工作当成有效抵制资本影响舆论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文化传媒领域作为舆论安全的重要前线，通过提升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满足公众精神需求的同时提升其对资本所带来的各种错误思潮抵制的自觉性，巩固舆论领域的反渗透防线。

制定中期长期规划，增强舆论安全前瞻性。可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传播、引导和管控策略，加紧制定好战略机遇期后十年我国文化传媒领域中维护国家和社会舆论安全、抵制资本对舆论领域的影响和操纵的中期战略规划和到本世纪中叶的长期战略规划，使我国舆论建构能力、把控能力、传播能力、整合能力赶上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要做好重点人群、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舆论的反资本渗透的具体战略，提前做好各种预案，准备好相应对策。

严格监管形成合力，构筑舆论安全新长城。在文化传媒领域的经营业务方面，紧抓内容生产、审核、传播、监管等各关键环节的管理工作，从体制机制上防止未经审核和违规生产传播的内容出现。与此同时，做好对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我国文化传媒领域的监管。另外，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针对资本对我国舆论领域的渗透与操控情况加以评估，可建立相应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李友巍，2011）。以多项具体指标为参考，了解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操控程度，并制定相应措施和管控细则，构筑保障舆论安全的新长城。

加强网络内容监管，降低资本操控舆论风险。鉴于互联网的全球传播、互动传播、实时传播等多种信息传播优势，需尽快建立健全针对网络内容领域的科学管理制度，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内容监管体系。确立国资文化传媒企业在网络内容领域生产、传播和引导的主导性地位，从立法层面建立网络内容业务的主体准入、资本准入、业务准入以及内容传播过程实名制等管理系统，使得针对网络内容的生产传播过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降低资本介入对网络舆论的操纵和侵蚀风险（唐汇西，2010）。

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掌握舆论传播主导权。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此同时，推进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资本介入文化传媒领域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资文化传媒机构应努力占领国内外受众市场,有效掌控舆论传播的主导权,抗击资本对舆论安全的冲击与消解(王爱玲,2012)。

(二) 建立健全资本准入政策,强化舆论管理

规范资本准入追惩机制,防范舆论风险。针对资本对传媒领域的介入,政府在进行预防性规制的同时,也能采用追惩性规制方式来避免和解决传媒领域的越轨行为。严格的预防性规制可能会因为防范过严,导致资本难以进入,使得传媒丧失发展活力,效率下降。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通过建设追惩性规制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对于我国针对资本进入传媒领域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理性的资本投资者绝不愿意顶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来抗拒严格的追惩性规制(姚德权,2005)。因此,制定并实施强势的追惩性规则,可以对我国传媒行业进行有效管控,避免出现传媒业失控的风险,从而保证了资本对传媒业的促进,也规避了其对社会舆论造成的威胁。

加强传媒行业制度建设,确保舆论导向。投资多元化有利于传媒产业做大做强,以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提升文化生产的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然而目前传媒业资本多元化是基于传媒经营性资产与采编、采播分离的基础上,其主要目的是保证舆论导向,防止资本对内容生产的影响。这种方式割裂了传媒业的产业链,其核心价值链环节被排除在资本之外,难以对投资者产生充分的吸引力,也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舆论导向与资本市场的合理对接,让两者相互促进。新加坡模式可以成为参考案例予以思考:区分管理股与普通股,政府控制管理股,不参与流通。一般情况下,管理股有与普通股一样的经济权利,但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人事等的表决中,每股管理股可相当于几百股普通股,由此保证党和政府对传媒的宏观控制。另外,可以参照英国政府控股英国电信的模式,实行“黄金股”控股制度(Kuznetsov,2005)。政府只在传媒组织拥有少量黄金股,黄金股在一般情况下无任何特权,但在传播内容、舆论导向、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项上可进行强制控制。除了党媒等公益性媒体确保国有独资之外,其他产业性传媒都可以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实现整体的资本多元化。

加快传媒资本法规建设,增强舆论管控。推进传媒产业立法工作,着手制定包括投资制度、税收制度、融资制度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传媒市场的开发、投资和交易有法可依,为传媒业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保障。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加强对

新媒体领域的控制,例如,在修订《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时,可将新媒体领域考虑在内,既从传统企业角度保护国内新媒体企业,更从新媒体企业所涉及的意识形态与舆论安全角度严格限制资本对我国新媒体领域的渗透、投资,也避免不符国家利益的新媒体企业外出上市。尤其需要严格限制在国内上市的新媒体企业的境外资本持股的整体比例,使得控股权必须在中国籍人士和国有企业手里。在转让条件方面也必须对解禁时间、审查条件、反恶意收购审查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Pezard, 1995)。

(三) 规范传媒产业资本介入, 加强舆论引导

明确资本具体准入领域, 占据舆论主导地位。传媒业同其他行业一样, 其资本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 但出于维护我国舆论安全的需要, 在传媒业对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开放的领域、方式和步骤等方面应当突出选择性与灵活性, 针对传媒业不同门类与环节的特点实施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和重点突破, 不能盲目搞“一刀切”。从战略角度考虑, 对于可能影响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整个产业利益的战略性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参股。从传媒业职能角度考虑, 针对宣传导向型的媒体应保持国有独资或者国家控股, 对于一般市场性的传媒机构可以准许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 实行资本多元化。从传媒业具体运营过程考虑, 新闻生产和传播等关键环节应该保持国有独资或者国家控股, 保证国家可以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舆论掌有引导权和控制权, 这对建立健康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将大有裨益。从传媒内容考虑, 针对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新闻产品, 包括道德伦理、传统文化、法律、军事等内容的生产, 应该保持国有独资或者国家控股, 而对与普通的科技、娱乐、大众文艺、生活服务等可允许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

资本运作中引入黄金股, 保障传媒产业安全。传媒行业进行产权改革所带来的最关键影响是将以往固定不动的国有传媒的部分产权, 通过适当方式进行转化和流动, 实现对资本存量的盘活。从传媒产业和舆论安全的角度来看, 传媒产业的资本运作应该也有必要借鉴和引入黄金股的概念, 针对可能产生自然垄断的产业或重要的公用事业, 国家可以使用的控制方式也应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进行行政控制, 使用黄金股也是比较有效的方式(魏杰, 2002)。国资传媒资本应该考虑介入到传媒产业的全产业链中, 但是也要有所侧重, 如针对内容生产和传播环节应加大控制和监管力度。在重要性相对较弱的环节中, 政府应该设置黄金股以代表公共利益, 使得其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决定性的最终决策作用。从多个层面的考察可以发现, 黄金股的设置比国资直接控股或独资控股有更大的优势, 因此可以在传媒领域尝试黄

金股取代实体股份,逐步试点和探索黄金股、普通股和优先股进行配套的股权结构,增加管理股、员工股等的表决权和决策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与此同时,保证政府在关键决策时具有绝对主导权(姚德权,乔海曙,2007)。这种制度设计既维护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主导权,又有利于保障传媒产业安全 and 国家舆论安全,同时也能充分调动传媒产业的发展活力。

(责任编辑:倪乐融)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冯宏良(2014)。网络时代的舆论传播革命与舆论引导困境探析。《学术论坛》, 37(05), 114-118。
- 傅其林, 冯春天(201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4), 32-34。
- 高山, 国园, 赵栋(2017)。主力军要上主战场——牢牢把握网上舆论斗争主导权。《红旗文稿》, (06), 39-31。
- 杭敏, 罗伯特·皮卡特(2011)。西方传媒的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冲突及影响。《新闻记者》, (11), 46-50。
- 郝月峰(2017)。美国新闻自由背后的资本自由。《新闻战线》, (15), 101-104。
- 胡翼青(2015)。《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楚新, 彭韵佳(2017)。透过资本看媒体权力化——境外资本集团对中国网络新媒体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 24(10), 68-78+128。
- 匡长福(2012)。新形势下抵御西方敌对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07), 65-68。
- 李道揆(1999)。《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友巍(2011)。《网络舆论风险评估体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武汉。
- 李忠伟(2014)。《当代中国国家舆论安全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成都。
- 李希光(2014年06月13日)。资本侵蚀危及网络安全。《中国社会科学报》, A06。
- 李希光, 毛伟(2015)。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闻媒体发展困局。《青年记者》, (21), 12-13。
- 李春雨(2015)。新媒体执政与舆论引导的策略研究。《电子政务》, (08), 2-12。
- 列宁(1921/1995)。《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列宁(1922/1987)。《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刘建明(1988)。《基础舆论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1867/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1867/2004)。《资本论(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1848/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1894/19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 上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孟小平(1988)。《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 唐汇西(2010)。《网络信息政府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武汉。
- 托马斯·迈尔(2000)。郭业洲, 陈林, 译. 热话题与冷思考(十六)——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4), 11。
- 魏杰(2002年11月03日)。为什么要拥有国有资产。《工人日报》。
- 王爱玲(2012)。《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论文。大连。
- 谢耘耕(2006)。中国传媒资本运营若干问题研究。《新闻界》,(03), 4-9+1。
- 喻国明(1993)。《中国民意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姚德权(2005)。《基于执政安全视野的新闻出版规制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长沙。
- 姚德权, 乔海曙(2007)。“黄金股”助推出版业产权改革。《出版发行研究》,(06), 9-13。
- 赵曙光(2002)。解读中国传媒第一股。《新闻通讯》,(06), 16-18。
- 邹庆华(2015)。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建设。《理论探索》,(04), 27-31。
- 张婷(2015)。《经济危机中的政府作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济南。
- Alice Pezard(1995). The Golden Share of Privatized Company.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0(13), 73-89.
- Childs, Harwood L.(1965). *Public Opinion. Nature, Formation, and Role*.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93).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van Kuznetsov(2005). The Legality of Golden Shares under EC Law. *Hanse Law Review*, 1(1), 22.
- Krippendorff K (200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Wienand E, Westerbarkey J, Scholl A (eds): *Kommunikation über Kommunikation. Theorie, Methoden und Praxis. Festschrift für Klaus Merten*. VS-Verlag, Wiesbaden, 129–149.